

复旦大学青年经济学者文库

外国直接投资、国内 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罗长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薪传学术 人才辈出

2005 年,复旦大学迎来百年华诞,而复旦经济学院也迎来了建院 20 周年的院庆。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科历史悠久,商科初创于 1917 年,1922 年经济学系成立,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并积淀了深厚的学术底蕴。在复旦的经济学发展史上,既有过樊弘、许涤新、漆琪生、吴斐旦、朱伯康、宋承先、陈观烈、蒋学模、张薰华、余开祥、洪文达、伍伯麟、洪远朋、叶世昌、尹伯成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又有目前在国内理论界名气日盛的中年经济学家,如姜波克、华民、张军、李维森、石磊、张晖明、李慧中等。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复旦大学又有一批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经济学者涌现。“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这是复旦的校训,也是复旦经济学人秉承的传统。这批青年经济学者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几乎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有些还在国外接受过经济学教育,且都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因此就经济学的训练来讲,他们经过现代经济学的严格熏陶,经济学理论基础相对扎实,研究方法较为先进。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一套丛书就代表了复旦大学部分青年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内容来看,丛书又分为两大部分:“转轨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丛”和“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论丛”。

“转轨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丛”是这套丛书的实践篇。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经济从封闭状态不断走向开放状态,融

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科学家很少遇到的“实验”机会每天在我们周围发生。“转轨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丛”就是复旦青年经济学人肩负振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双重使命;“旦复旦兮,经世济民”,面对中国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经济问题,上下求索,各方求证,虽然还留有稚嫩的痕迹,但不失为一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科研成果。

论丛涉及的范围是广泛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增长问题,产业经济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和水资源配置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难解的顽症,地区市场分割就是其中之一。本来大国国内市场为充分发挥本国产品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提供了一个初始的有效的环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并不发达,国内市场被地方保护主义分割成区域性市场,使得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无法实现,从而使我国在参与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缺乏国内资源配置合理化的支持,最终影响到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钟昌标博士的《转型期中国市场分割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一书考察了我国市场分割的表现、测定、形成原因和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针对市场分割对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作者提出了诸如深化市场取向改革来消除区域性市场分割等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产业的横向联合,努力打破行政区域设置的进入壁垒,加大国内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外国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罗长远博士的《外国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与现有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文献不同,没有局限于

讨论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溢出效应,而是运用1987—200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FDI与国内资本关系的角度讨论了它对转型与增长的影响。他的结论是:FDI对国内资本成长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对国内资本的支持力度;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通过考察FDI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显著正影响而得到证明。相反,国有资本对TFP没有显著影响,个体资本对TFP存在显著的负影响;FDI对国内资本投资有显著的带动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有资本投资的促进上。这些结论对我们理解FDI如何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FDI与我国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以及我国金融体制将如何进一步更好地利用国外和国内资本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本外逃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困扰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牛晓健博士的《中国转型时期资本外逃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资本外逃问题。在对资本外逃进行重新界定的前提下,作者综合了国内外测算资本外逃的主要的方法:游资法、余额法和多利法,提出了适合我国转型时期资本外逃的估算方法——结构法。通过研究,作者发现我国的资本外逃有以下特点:(1)资本外逃的规模较大;(2)资本外逃中含有大量的“过渡性资本外逃”;(3)资本外逃没有对宏观经济形成恶劣的影响。作者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可能导致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的汇率、实际外债流量、国际储备的流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我国转型时期的资本外逃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是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在对资本外逃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

出了相应的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如加快金融深化步伐、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建立对于资本外逃的监控机制等。

中国经济自 1978 年以来连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如此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效率如何?这些一直是中外经济理论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樊潇彦博士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研究》一书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渐近内生增长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的理论基础,在一个相对较为完整和严密的分析框架内,提出了“宏观投资效率”的严格定义和测度标准。在吸收和借鉴了当前经济增长核算和宏观总量生产函数计量方面的最新成果后,作者重点做了两方面的实证研究:(1)利用现有多国 TFP 比较研究的成果,对 OECD 国家、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作了全面的对比,并对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进行了国际比较;(2)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测算出了我国的 CES 总量生产函数,并以此为基础作了分地区、分时段的宏观投资效率比较。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作出了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和判断。这样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特别是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结构将面临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带来巨大影响。封进博士的《人口转变、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一书首先构建适当的模型,并对有关参数进行估计,经过数值模拟后所获得的结论显示: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资本存量、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次,作者根据中国目前城镇养老

保险体系,建立起一个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相混合的模型,并在模型中假定社会福利函数兼顾效率和公平,通过对我国实际经济运行和人口转变情况的分析,得出我国未来的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尤其在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难以保证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收益率时,现收现付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为了维持现收现付制的可持续性,一些可行的方法包括延长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的替代率、通过城市化进程扩大养老金的覆盖面等。在我国,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只覆盖了城市就业人口的不到50%,而且不断增加的农村移民劳动力尚未纳入正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所以扩大覆盖面有比较大的空间。这些观点对我国当前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批论丛中唯一涉及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的一部著作是周耀东博士的《中国公用事业管制改革研究》。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的航空公司联营和票价打折,铁路和公路等运输部门春节涨价,城市供水、供热、供电等基础部门的价格上涨以及邮政、电信等通信部门阻碍进入等诸多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关于我国公用事业部门的重新构造就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从各国的公用事业部门管制改革的方向来看,引入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但对于在这些具有自然垄断产业部门中,如何形成有效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如何构建一种既能够满足企业的生产效率,又能够实现社会公共目标的有效的管制体制,理论和实践都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作者从我国公用事业管制改革出发,以现代管制理论为框架,借鉴西方成熟的公用事业管制经验,探索形成有效管制体制的路径和依据。这对于厘清我国公用事业部门管制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经济在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其所面临的经济资源的制约问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其中粮食安全问题和水资源合理配置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高帆博士的《中国粮食安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从政府—市场互动的视角出发,讨论了我国粮食安全所涉及的诸多领域。作者认为,我国粮食问题面对的是系统性风险,从根源上看,系统性风险源于转轨时期政府—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于对风险特征的理解,作者给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粮食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并计算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粮食安全程度,结果显示,我国的粮食安全程度在波动中提高。就粮食政策来看,政策的单向度和风险的系统性之间是不对称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粮食安全程度也经常波动。未来的粮食政策应该回应当前政策的单向度,促使粮食安全程度的持续性提高。由此出发,作者提出了完善我国粮食政策的原则、思路及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建议的关键是在粮食领域中促使政府—市场的有效互动,通过政府调控下的有序市场化来实现我国的粮食安全目标。

刘伟博士的《中国水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以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对全球和中国水制度变迁的动因、路径、方向和特征进行了分析;从水作为混合物品的属性出发,构建了水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得出了如何由多元机制共生进行水资源配置的方案。作者经分析后认为,建立中国市场扩张型水制度,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努力降低水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二是重视水制度改革中水法、水政策、水行政的协调一致;三是率先在缺水严重的地区和流域实行严

格的市场扩张型水制度。

“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论丛”是这套丛书理论篇。这部分著作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1)纯粹经济学前沿理论问题的研究(2)从经济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引申出对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有着重要意义的命题(3)由于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困惑而去寻求理论问题的突破。

寇宗来博士的《专利制度的功能和绩效》就是一部纯理论研究的专著。该书通过对专利问题的文献进行有选择的综述,逼近该领域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所在,然后通过建立模型、演绎推理、严密论证,对专利制度的起源、运行及其福利结果进行深入考察,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专利制度的本质——专利制度乃是社会计划者向潜在创新者提供的一种机密交换契约,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对专利制度的功能和绩效进行了有效的讨论。

章元博士的《非对称信息下的团体贷款研究》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专门研究银行贷款中的一种特有贷款——团体贷款——现象的,其实是借团体贷款现象讨论信息非对称情况下如何优化配置经济资源这一经济学的一般命题。在金融领域,银行与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使银行面临着“四大难题”——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审计成本、契约执行,这些难题又会导致银行“信贷配给”,而团体贷款在解决这一“市场失灵”中表现非凡。作者围绕“为什么团体贷款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成功”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力图解释团体贷款成功中的一般经济学含义,从而推进经济学关于信息非对称情况下经济主体活动规律的研究。

王永钦博士的《声誉、承诺与组织形式——一个比较制度分析》旨在探讨一个社会中社会经济制度和组织形式背后的决定因素,回答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里规则被人操纵的程度

不同 承诺得到遵守的程度不同 法律得到实施的程度不同。与此相关 具有经济学意义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的社会盛行的是非人格化、保持距离型的经济交往 ,而有的社会流行的是人格化、关系型的经济交往 ? 从金融制度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在有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中 非人格化的、保持距离型的融资如证券市场的融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 关系型的融资如银行等金融中介的融资在资源配置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 这些差别有更深远的经济学含义吗 ? 作者通过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从社会的声誉结构、分权和社会分工三个维度对以上现象进行了解释 ,从而也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经济组织方面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微观机制。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这个题目看起来也是一个关于中国实际经济问题讨论的题目 ,因为这是一个当前被经济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题目。但是 赵红军博士的《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却没有从通常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 ,而是从一个非常理论化的角度 ,即从交易效率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他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 ,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因而由于地理空间而产生的运输成本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签约、履约等产生的交易成本便被忽略掉了。第二 ,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很难有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立身之地 ,他的研究则将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转化为交易效率从而将它引入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中。在这样的分析框架基础上 ,作者对城市产生、城乡差距的出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内容演进、伴随着交易效率提升的城市地价地租升级以及城郊化、城市位置、规模、级层体系及城市内生增长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不管这样的研究框架是否严密 ,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其理论创新的勇气都是值得鼓励的。由于此书的理论色彩多于实践色彩,因而也应该被归在理论前沿问题的研究部分。

张晏博士的《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是一本探讨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财政政策问题的著作,并系统地对我国分税制改革前后的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本书应该是一部对中国实际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的著作,之所以放在“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论丛”中,是因为该书的理论色彩非常强。该书一是采用标准的财政分权理论框架,引入不完全人口流动和内生劳动供给选择的假定,分析在同时存在多级政府之间的水平和垂直财政竞争情况下的最优政府支出、最优税收和最优转移支付政策;二是在前人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含初始禀赋(如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技术水平、环境)差异的FDI税收竞争模型,分析两个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及其效率含义,并考察垂直分权安排对竞争效率的影响。通过这些理论模型的演示,作者得出若干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与前面几本书不同,孙立坚博士的《开放经济中的外部冲击效应和汇率安排》研究的是在开放经济前提下东亚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面临多重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作者力图站在这个问题的理论前沿,一方面结合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当前最新发展的国际金融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行讨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透析出现代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的起点很高;另一方面,把问题的焦点放在矛盾最多、理论结论最少的东亚国家和中国,探讨这些国家的汇率安排如何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受到来自贸易和资本流入这两大渠道的外部冲击,在实践上回答这些国家出现

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该书的特点虽然主要也在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但是同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使命感,是作者在对日益对外开放的中国如何进行汇率安排的思考下寻求的理论突破和创新。

属于理论色彩强于实践色彩的著作还有林竞君博士的《网络、社会资本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作者试图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及理论观点出发,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衰落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进行新的跨学科解释。认为产业集群研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分工、协作的制度安排,它的形成是基于一定文化背景下,通过区域共同体成员间网络互动得以建构的,是嵌入于区域特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结构性嵌入)和网络成员信任网络(关系性嵌入)之中的。同时从创新的角度看,集群实质上也是某种知识的分工、协作的网络综合体,集群的创新效率取决于企业知识的获取、整合能力以及企业间的知识扩散程度。作者不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研究企业集群的问题,而是将社会学中的最新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相结合,研究企业集群这种目前日益重要的经济现象,令人耳目一新。

回顾过去,复旦经济学人有资格感到自豪;放眼未来,复旦经济学人也真切地认识到挑战和责任。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给经济学人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对挑战,复旦经济学人要继承学术传统、勇于学术创新,将复旦的经济学学术声望进一步发扬和提升。

袁志刚

2005年8月15日于复旦园

过去 15 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持续流入。累计总额高达 6 000 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大约 46 万家外资企业使中国的贸易部门在过去的十年获得了迅速的扩张。从统计数字上可以简单地看出 ,在不断提升的贸易/GDP 比率中 ,FDI 主导的加工贸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 ,对经济学家来说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们怎样估计和评价 FDI 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贡献。为了较为精确地估计和评价 FD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需要理解 FDI 对决定经济增长或者决定产出变化的那些因素的可能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我们所理解的这个“ 矢量 ”关系的理论。

因为 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作用机制相当的迂回和复杂 ,现有的经济研究大多高度关注理论的构造。这个理论的功能显然是为了厘清 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方式和作用机制。在这个方面 ,现有的文献相当丰富。但是 ,因为任何具体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作者的局部经济观察和偏好基础上的 ,因此 ,已有的理论要么成为被日后的更多经验观察去检验的对象 ,要么为日后更好的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数年前当我第一次接触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联系 (growth-financial intermediary nexus)的文献时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开采的矿藏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为我们加入这个研究的行列提供了机遇。我们不该错失这个机

会。我最初的好奇心来自于现有文献的一个基本结论：一般来说，金融深化（一般用于描述更有效的分配金融资源的过程）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而且跨国的经验研究和诸多国别研究相当支持这个结论。进一步来说，这个结论的理论基础与经济学并不冲突，逻辑简单明了。可是当我们简单地把这个理论对照中国经验时，我们就会感到困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国有企业占据 70% 的信贷资金并存。也就是说，国有部门在浪费着金融资源，私人部门面临严厉的金融约束，而经济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动力。

这提示我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的关联中，一定存在着在别的发展经验中不曾存在的鲜为人知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各自的理论构造和经验检验来逐步将这个独特的机制发掘出来，并弄明白它可能的“工作原理”。最近的文献表明，在试图发现这个机制的过程中，比较多的经济学家强调了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漏损”机制。但我个人的经验嗅觉更倾向于从“地方分权”的决策体制中寻找答案。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由于地方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国有银行在信贷配置上对“最佳实践”的偏离也许并没有那么大。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比重被认为相当的高，但是正像日本和东亚经济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这个高比例的不良信贷不过是银行过度贷款和企业过度借款这种高速增长过程的一个结果罢了。

另一个可能的作用机制与 FDI 的增长有关。在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分权体制里，招商引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地

区经济发展的启动机。现有的文献考察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 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通常都不难理解,FDI 在资本形成、技术转移、管理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对东道国经济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尤其是控制住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的其他可识别的解释变量之后,我们是否可以证实 FDI 的积极影响,是否可以识别 FDI 主要是通过什么机制发生这种影响的,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FDI 与国内资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挤出”国内资本了吗?国内资本又可以分成国有资本(包括国有和集体资本)、私人资本(包括个体资本、股份资本、联营资本及其他资本),具体来说,FDI 与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关系的方向与大小?这种关系对中国的转型进程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如果 FDI 对国内资本的作用方向与“民进国退”的方向一致,则 FDI 就是中国转型的“助推器”;相反,若 FDI 对国内资本的作用方向与“民进国退”的方向背道而驰,则 FDI 就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中国的转型进程。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涉及增长,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实现的?FDI 带动了国内投资的增长吗?FDI 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吗?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FDI 与国内资本又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它比国内资本更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吗?这种关系又主要与什么因素有关?

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罗长远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总体上来说,他是在转型与增长的背景下,从与国内资本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FDI 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第 2 章从理论上为中国的转型构建了一个概念性框架,即“民进国

退”这个“封闭性”的模型为引入和讨论 FDI 这个外部变量提供了平台。第 3 章中,从理论上讨论了 FDI 与国内资本的关系问题,通过“投资者甄别机制”模型,找到了 FDI 对那些分散、弱小的国内资本具有“挤出效应”的逻辑。第 4 章,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讨论了 FDI 与国内资本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链接”起来,结论是 FDI 对金融支持较强的国有资本具有“挤入效应”,对金融支持最弱的个体资本具有“挤出效应”,对金融支持介于二者之间的股份和联营资本没有显著影响。结合第 2 章的概念性框架,作者通过第 3、4 章的分析,指出 FDI 对国内资本的作用方向与“民进国退”的方向不一致,并认为 FDI 对中国的转型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在第 5 章,作者将视角从转型转移到增长上,这也是很多关于 FDI 的研究所讨论的热点,不过他是从与国内资本的关系角度来考察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控制住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后,他发现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带动了中国国内自身的投资(尤其是国有部门的投资),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言,FDI 的影响显著为正、个体资本显著为负、国有资本没有显著影响;最后,作者认为 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无论是相对于国内资本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还是对国有部门投资的带动,都与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部门支持的相关。

作者认为中国转型与增长背景中 FDI 的特殊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金融体系“主动配合”的结果。具体地说,金融体系在整合国内资本上的低效率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歧视,

既不利于分散、弱小的私人资本应对 FDI 进入后日益加剧的竞争局面,也不利于它们吸收 FDI 进入后带来的“外溢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应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在本书第 7 章,作者从中国实体经济的构成及动态变迁的角度,通过“金融结构的项目属性”模型,对金融结构的“内生性”作了理论上的尝试。

应该说,从与国内资本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FDI 对中国转型与增长的影响,并将这种特殊影响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是本书的特色,也是相对于别的文献的创新之所在,也为 FDI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作者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所作的实证研究,在方法上也是对研究 FDI 在中国的影响的创新。然而本书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作者所提到的“国内资本投资不旺”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相对性的命题”,也与 2004 年以来的经济“特征事实”有些不符;仅仅从对国内资本的影响的角度,是否能够推断 FDI 对转型的影响,还有待商榷;实证研究中工具变量的选取也有讨论的余地,当然在学术界这也是争论较多的话题。对一个做学术研究的新人来说,这些都不算是大问题,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况且没有这些不足,也就没有下一步研究的激励和出发点。

罗长远在中南财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我很荣幸地担当他的指导教师。我观察到,他勤奋努力,对经济问题有很好的直觉,也有扎实的基础,再加上刻苦,很快把精力转入到了实证研究上。他是在校园里与我讨论问题最多的几个同学之一。受到我的影响,他入学不久就开始对中国的资本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这个研

究题目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加入了我领导的研究项目组。我们两人很快就开始具体合作关于外资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工作。我阅读的文献全部都转给他去阅读,然后我们讨论理论的框架,探讨如何设定计量方程,需要获得什么样的数据等。这一年多来,罗长远为这个题目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今天,他利用在维也纳经济大学学习研究的机会把过去一年半以来的工作成果整理为一本专著,并被纳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向百年校庆献礼的出版计划,作为导师,我感到非常愉悦和自豪。这本书的出版实际上也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又一个阶段性的作品。

我今天下午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复旦精神”的问题时说,复旦精神在我看来与她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有关。在校园里,今天没有了上世纪最后20年恢复高等教育之后出现的大师云集的场面。在学术上,今天的校园没有了权威,到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学术可能因此就有了希望。在经济学的这条道路上,愿与罗长远并肩努力。

是为序。

张 军

2005年4月27日于复旦园